

20世纪60年代

“王昭君形象”的生成及其影响

乔琛

内容提要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以“昭君出塞”的历史事件为引子,提出了用文学表现民族团结与融合的任务,王昭君形象因此引起了史学家、文学家的关注。此后,在官方号召、史家印证、文学助力的格局中,王昭君形象有了统一的意义:她“自请出塞”,成为促进汉匈50年和平友好历史的“使者”。这个在空前政治化语境下得出来的结论,明显存在杜撰“历史”细节、“以论代史”,夸大个人历史作用,简化民族关系等诸多问题,其影响延续至今。因此,只有回到史籍记载的文本,廓清昭君出塞的历史线索,才能走出影响,触摸到客观真实的历史。

关键词 王昭君形象 民族团结 昭君出塞

乔琛,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235000

王昭君出塞的故事最早源自《汉书》,其记载虽简略,然而其中包含了汉朝与匈奴关系的大势、包含了王昭君作为待诏宫女出塞“和亲”的清楚的时间与地点、包含了她赴匈奴之后按照匈奴收继婚习俗,成为父子两代单于王阏氏的经历,以及她与两代单于所生子女,一直到她的孙辈,皆有确凿有据的记载。

照理说,王昭君的历史并未为后人提供多少想象空间。然而,后世却带着各自时代的价值观和情感,借王昭君“说事”,塑造出五花八门的王昭君来。累朝历代不断产生有关王昭君的笔记小说、敦煌变文、诗词戏曲等多种多样的形式,使得王昭君的话题从来不曾冷落过。自古至今,形成一部流动的“昭君文化史”,其影响力远远超过“昭君出塞”历史事实的本身。

考察这些不同时代的“王昭君”,可以发现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即所谓的“贞节”意义上的标杆越悬越高。在据称是出自蔡邕(133-192)的《琴操》中,昭君在面对收继婚、必须继续嫁给儿子的时候,“乃吞药而死。”到元代马致远(约1250-1321至1324)的《汉宫秋》道德的标杆达到了极致:王昭君根本不曾到匈奴去,而是在汉、匈交界处就已经投江自尽了。

与此相反,只要稍微接近历史的真实,就会受到严厉的道德批判。例如宋代诗人王安石的诗歌《明妃曲》中,因有“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的句子,为此就受到了无情的挞伐:“此所谓坏

天下人心术。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以胡虏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兽而何?”^[1]

进入20世纪,伴随着“五四”反封建主题的拓展,王昭君形象的贞节意义不再受关注,但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报刊、论文、著作都试图揭示昭君出塞的“真相”,赋予多样化的昭君形象以惊人一致的意义——她不是“悲怨”的形象,是笑嘻嘻地“自请出塞”,换来了汉匈50年和平友好的局面。结果是,所谓的“真相”导致了另一种假相,其产生的背景,发掘历史的现实教育意义的指导思想,寓于其中的研究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方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思维方式的影响,都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一、一项任务的提出

1978年,曹禺的五幕话剧《王昭君》上演,次年在接受《解放日报》采访时,他两次强调,“这是周总理生前交给我的任务。”^[2]曹禺回忆六十年代初,内蒙的一位领导同志向周总理反映,汉族姑娘一般不愿意嫁给蒙族的小伙子,周总理说:“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不要大汉族主义;古时候就有一个王昭君是这样做的!……‘曹禺,你就写王昭君吧!’总理还提议大家举杯,预祝《王昭君》早日写成。”^[3]

除了直接对曹禺提出要求外,周恩来总理还曾多次提到过“王昭君”。例如,建国初期,内蒙性病流行,导致了不孕和孕而不育的后遗症。后来经各方努力,陆续将2000余名江南孤儿、弃婴,送入蒙族家庭,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牧区缺少儿童的问题,提振了牧区的人气。1959年,在一次庆祝包钢出铁的宴会上,周总理端着一杯酒来到支持往内蒙送儿童的康克清跟前与她碰杯说:“希望你多送些王昭君来!”原来,这些孩子就是周恩来说的“王昭君”^[4]。

“文革”期间,周恩来坚决支持侄女周秉建去内蒙古插队,热情鼓励她“在内蒙古安家立业,为汉蒙和睦再传一个佳话”,做一个“现代的王昭君”,周秉建后来果然与蒙族歌唱家拉苏结为伴侣^[5]。

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1957年8月4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他强调指出,为了在平等友爱的民族大家庭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祖国,“我们要把历史上的痕迹消除掉,要把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状况逐步消除掉”^[6]。周恩来赞赏王昭君,显然是与上述目标一致的。他要求曹禺写王昭君,包含着要求文艺体现时代需求的期望。

其实,带着“任务”写作,在毛泽东提出为曹操“翻案”时就已经开始。1958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座谈会上又谈到曹操,“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7]有论者认为,“提出‘替曹操翻案’,只是历史学战斗任务的开始”^[8]。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就是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之下的产物。

[1]李之亮:《王荆公诗注补笺》,〔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112页。

[2]汤娟:《曹禺同志谈新作〈王昭君〉》,田本相、刘一军主编:《曹禺全集》(第七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页。

[3]曹禺:《昭君自有千秋在——我为什么写〈王昭君〉》,〔北京〕《民族团结》1979年第2期。

[4]康克清:《康克清回忆录》,〔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232页。

[5]危春勇、周秉建:《伯父要我做现代王昭君——周恩来小侄女的回忆》,〔南昌〕《大江周刊(焦点纪实)》2008年第3期。

[6]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1页。

[7]陶鲁茄:《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泽东》,〔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8]赵纪彬:《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几个问题》,〔北京〕《光明日报》1959年6月21日(3)。

“任务”当然不仅限于历史学领域,而是继续延续到其他部门。1960年,中国剧协举行由历史学界、文学界、戏剧界共同参加的历史剧座谈会,“历史学家在发言时,都强调历史剧的教育意义,有人认为它的作用比历史教科书还要大。”在会上,翦伯赞还特别指出:“历史剧不能完全全照着历史事实来写;一位作者如果跟踪历史事件,一步不离,就会把许多毫无意义的事件写进去,对观众毫无教育作用。”^[1]历史剧现实教育意义的开掘,被当作“任务”的目标。

翦伯赞在1960年发表的《给文成公主应有的历史地位》一文中,对历史剧的“任务”做了更加具体的诠释,即“唤起已死的人物,其目的是在于赞美新的斗争”^[2]。与文成公主属于同类题材的王昭君出塞事件,其“任务”目标当然也是相同的。于是,王昭君出塞被做成了关于“赞美新的斗争”,“促进民族友好关系”的众口一词的“命题作文”。

二、一篇史论的应和

1961年,史学家翦伯赞发表《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一文,旨在通过梳理“公元前一世纪下半期汉与匈奴之间的关系的的全部历史”^[3],推翻历史上人们对和亲政策的种种非议,揭示王昭君出塞对于民族团结所做的贡献。其结论是昭君出塞:“这个标志着民族友好的历史事件,却被过去的诗人、戏剧家宣布为民族国家的屈辱,而王昭君则被描写成一个抱着琵琶而恸哭的悲剧人物。这在今天看来是很不妥当的。”翦伯赞认为“应该让王昭君从天国回到人间,从道德领域回到历史领域,昭君出塞这个历史事件才能得到正确的说明”^[4]。以此为出发点,翦文在以下三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观点。

其一,变王昭君被迫出塞为“自愿请行”。

1960年春,翦伯赞在回复张名彦信中说,“王昭君自愿请行和亲之说,首见《后汉书》。《后汉书》作者范曄,刘宋时人,可能是根据当时的传说写的”^[5]。此处可见一个史学家的审慎和冷静。奇怪的是,就在写此信的一年之后,翦伯赞在他的文章中,首先说明,“昭君出塞是自愿还是被迫的,谁也不知道”,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直接以《后汉书》为依据讲述王昭君出塞事件,他对自己的思路做了如下解释:“《后汉书》的作者范曄说王昭君自己‘向掖庭令请行’,我以为这是合乎情理的。只要看一看《汉书·外戚传》记载的妃嫔生活就会觉得一个宫女自愿请行去和亲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的掖庭,对于一个宫女来说简直就是一座人间地狱。一个宫女被送入掖庭以后,不能指望在活着的时候会能得到人身的自由……‘向掖庭令请行’正是一个被迫害的女性……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野蛮的人身凌辱和迫害提出的严重抗议。”^[6]

以“我以为合乎情理”的个人情感倾向代替史证,应该与史家的研究方法相悖,更有甚者,翦论中王昭君反封建的思想境界,已经完全跳出了她所处的时代,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个现代新潮女性。然而,此论却与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倡的所谓历史事件的教育作用极其吻合。

在此基础上,翦伯赞先生进一步做了两个想当然的推论:一是王昭君对匈奴社会有着非同一般的了解,她眼中的匈奴人的社会“并没有过去的诗人戏剧家想象的那样可怕”^[7];二是王昭君对她未来的配偶呼韩邪单于了解得更多:他是第一个亲自款塞入朝、和汉王朝缔结“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相攻讦”的友好盟约,是第一个带着蒙古草原这一大片土地加入大汉帝国的匈奴单于”^[8]。不难看出,这些纯系论者的主观臆测。翦论因此陷入了自己曾经反对过的“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的误

[1]《中国剧协举行历史剧座谈会》,〔北京〕《戏剧报》1960年第22期。

[2]翦伯赞:《给文成公主应有的历史地位》,《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74页。

[3][4][6][7][8]翦伯赞:《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75页,第484页,第487页,第487页,第488页。

[5]翦伯赞遗作:《王昭君家世、年谱及有关书信》,《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

区,把一些臆想的结论强加于具体的历史,歪曲甚至割裂具体的历史,使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服从历史学家主观的意图^[1]。

其二,批判班固的“和亲无益论”,提升王昭君出塞对于汉匈和平的意义。

翦伯赞在文中说:“从汉武帝元光二年到汉元帝竟宁元年(前三三年)昭君出塞之年,其间整整一百年,汉王朝与匈奴部落联盟统治集团之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之中……昭君出塞之年,正是匈奴绝和亲一百周年,很明白寄托在她身上的政治使命是恢复中断了一百年的汉与匈奴之间的友好关系。”^[2]“事实的发展是符合于汉王朝的期望的,昭君出塞以后,汉与匈奴之间有五十年左右没有战争。”^[3]

论证这个问题,翦伯赞陷入了矛盾之中,他一方面承认汉匈和平局面的出现“不完全是王昭君的作用”^[4],另一方面又试图表明昭君出塞后,“燃烧了一个世纪的烽火熄灭了”,“一直到王莽执政时期,汉与匈奴还在利用王昭君的关系来缓和民族之间的矛盾”^[5]。

客观地说,翦伯赞在阐述王昭君的贡献时,相对比较谨慎,论据源自于《汉书》。但是,一涉及“民族团结”的意义,他就离开史实,夸大了这个历史事件的作用。

第三,去除王昭君形象在文学传承中的悲怨色彩,擦掉王昭君的眼泪。

翦伯赞先生认为王昭君出塞故事具有共同性“缺欠”:诗人是“借王昭君的眼睛,流出自己的眼泪”^[6];戏剧家们依据的是几乎完全一致的道德蓝本——“皇帝是情种,画师是败类,王昭君是封建专制主义最驯服的奴才,匈奴人是汉王朝最凶恶的敌人,而昭君出塞则是中国历史上涂不掉的屈辱的印记”^[7]。其实,翦伯赞先生指出文学传统中的王昭君的“缺欠”时,缺乏的正是历史的眼光,在提倡“擦掉王昭君的眼泪”、消除王昭君传统中的悲怨形象的过程中,与眼泪一起被擦掉的,还有人们对于王昭君作为生命个体的最基本的悲悯情怀。

今天看来,翦伯赞先生《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一文为了迎合“民族团结”的政治主题,因而罔顾史实、导致逻辑矛盾和简单化倾向。其对史实的歪曲,一点儿也不亚于传统文学中的王昭君形象,却被谬称为昭君出塞的“信史”,对当时乃至当今的影响不可低估。

三、一个剧本的演绎

1978年,曹禺的五幕剧《王昭君》终于面世,他把剧作主题定位为“歌颂民族团结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立意改变“啼哭悲泣”的昭君形象。曹禺把自己创作昭君形象的依据归纳为: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提议;《后汉书》记载的昭君“自愿请行远嫁匈奴”;翦伯赞的史学结论;自己两次到内蒙古和新疆去深入生活听到的民间传说^[8]。这不仅揭示了王昭君形象在新环境中生成的背景,而且,在有意无意中呈现出昭君故事在官方号召、史家印证、文学助力的格局中,借民间传说形成一致口径的过程。

曹禺五幕话剧《王昭君》构思是在1960年代,“四人帮”时期,曹禺失去了创作自由,所以剧作最后完成的时间是1978年。不过,经过了近20年,曹禺最初的构思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剧作在前两幕中表现了王昭君的双重自觉性。

其一是反封建的自觉性,作家刻意塑造了前朝皇帝所封的孙美人形象,她从二十岁进宫到六十多岁,从未被皇帝召见,她疯了,每天涂脂抹粉,时刻等待皇帝的“宣诏”。——且不说此事离事实有多么遥远,累朝历代,哪有一个皇帝那么仁慈,能够把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宫女养在“掖庭”那么多

[1]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5页。

[2][3][4][5][6][7]翦伯赞:《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76页,第477页,第477页,第479页,第480页,第484页。

[8]曹禺:《王昭君·献辞》,〔北京〕《人民文学》1978年第11期。

年?——最后,她被强行送到“先皇坟里去”殉葬,却自以为是皇帝召见,竟然“欢喜过度,一下子就断气了”。孙美人的遭遇,使昭君看到了自己暗淡的前景,更坚定了她出塞以抗争自己处境的决心。

其二,促进民族团结的自觉性。昭君对于“和亲”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她把一首在当时流行于乡俚下民阶层的情歌——“长相知”,从后宫唱到汉庭,并对之做出充满才情和寓意的解释:“于今,汉匈一家,情同兄弟,弟兄之间,不就要长命相知,天地长久吗?长相知,才能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长相知,长不断,难道陛下和单于不想‘长相知’吗?难道单于和陛下不要‘长不断’吗?”于是,元帝、单于连连称好,“全朝上下也忽然欢快起来。”曹禺笔下的王昭君形象,近乎完人。她的自请出塞,既是为了追求自由和幸福,也是为了促进汉匈和平友好。

王昭君的自觉性,在剧作后三幕表现为出塞之后努力促进民族团结。她细心揣摩单于对已故玉人阏氏的痴情,她出塞前,单于把玉人的雕像从龙亭送到大青山,昭君到匈奴后,又将之搬回原处,单于深受感动。她和单于妹妹阿婷洁公主情同姐妹。在受到匈奴重臣,阿婷洁公主的丈夫温敦陷害时,昭君忍辱负重,郑重承诺“决不辜负朝廷和黎民百姓”,直到真相大白。正如钱理群先生说的那样,“王昭君出使匈奴后,一言一行,甚至一投足、一扬眉,无不从‘胡汉和好’的全局出发,处处注意政治影响”;即使是与单于夫妻间深夜谈情,也不忘记申明“我是带着整个汉家姑娘的心来到匈奴的”^[1]。整个剧作中的王昭君,完全不像一个嫁到匈奴的十九岁的姑娘,倒是处处表现出大汉使者、成熟政治家的风范。与《王昭君》的主题几乎完全一致的还有田汉的剧作《文成公主》,也是同样的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

1962年,周恩来在《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批评曹禺说:“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写作上好像反而有了束缚……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2]这话可谓直捣要害,揭示出解放初期曹禺戏剧创作最根本的问题。《王昭君》就是这样一部毫无“主见”的作品,它是对翦伯赞史论亦步亦趋的形象化表现。二者以高度统一的口径,强化了被涂抹得面目全非的“王昭君形象”的影响力。

四、一种影响的延续

20世纪60年代王昭君形象的产生,是高度体制化的政治、历史、文学诸领域共同运作的结果,形成了特殊场域中的“王昭君现象”。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们似乎已经走出了那个特殊时代,然而,产生“王昭君现象”的思维方式和对历史的态度仍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从总体上看,20世纪80年代至今,关于王昭君的话题,学理性的研究相当薄弱,“昭君出塞”多以故事形式进入种种读物和读本中,这些读物和读本往往标榜自己写的“历史”是“国民必知的”,可以“一本书读通”的,甚至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因此而扩大自己的影响。一些报纸,更热衷于以揭示王昭君“出塞真相”的字眼吸引读者,加之互联网没有任何甄别的快速粘贴转载,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王昭君形象”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被全方位传播并得以固化。

一些论者仍津津乐道于王昭君形象的教育意义,将之刻意拔高为“挺身而出,慷慨应召,自愿扮演一个‘和亲使者’的角色”,甚至说“她更多地想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她以为国吃苦为荣,把谋求自身的解放和谋求为国效力统一起来,所以才毅然做出自请和亲的重大决定”^[3]。更有人杜撰昭君出塞后过着幸福生活,寡居后也不忘“沟通与调和”汉匈关系,并揣度昭君之死缘于“眼看自己创造的和平岁月毁于一旦”^[4]。

[1]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5页。

[2]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北京〕《文艺研究》1979年第1期。

[3]林干、马骥:《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

[4]叶贤思编著:《湖北历史名人》,〔北京〕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2006年版,第492页。

作为历史事件,“王昭君出塞”陷入了“精心编制的神话和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之中,“并使人们的意识处于一种自动接受的无意识状态”^[1]。在文学、戏剧、影视等艺术形式当中,“自动接受”影响的编者,胡编乱造、无中生有地戏说历史的现象比比皆是,进一步模糊了历史的印迹。一个中学生在其获奖作文中写道:“昭君出塞,包含了大爱与牺牲,成全万民,书写和平。”^[2]不能不说,任由所谓“宏大意义”无限制漫延,放任“陈词滥调”传播,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可能将永远失去感受、触摸历史真实的可能性,这应该不是危言耸听。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复兴绝不是靠谎言可以维护的。

五、一个源头的廓清

学者姜义华指出:“没有真正可信的历史,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会趁虚而入。”^[3]而上文所涉的关于王昭君的论述,所缺的恰恰是客观真实的历史。因此,笔者认为,回溯“昭君出塞”事件的源头记载,将王昭君的历史真实写下来,或许有助于改变那些游谈无根的胡编乱造的行为。

由于《汉书》的作者班彪(公元3年-公元54)、班固(32年-92年)父子离王昭君生活的时代甚近,且又有“当事人”讲述他们的所见所闻——例如,班彪的外祖父、匈奴人金敞对他评述汉成帝等(《汉书》卷9《元帝纪》注引应劭曰:“外祖,金敞也”)^[4],故史料的可信度较高。

对于“昭君出塞”的历史事件,《汉书·元帝纪》从汉朝角度做了记载,《汉书·匈奴传》从匈奴的角度做了记载。两处记载均涉及一个重要的史实——公元前36年,西汉王朝为了肃清匈奴在西域地区的势力,派甘延寿、陈汤远征康居,并杀死了郅支单于。与郅支单于争位的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5],喜的是汉朝替他除掉了政敌,惧的是汉朝的力量如此强大。于是,“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6]。“稽首来宾,愿守北藩,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7]在匈奴臣服,汉匈双方达成和平默契的背景下,王昭君被赐予呼韩邪单于。所以,和平局面的形成不取决于昭君出塞与否。

那么,王昭君出塞后的处境如何呢?《汉书》对于王昭君到匈奴后的直接记载主要是,“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8]呼韩邪单于死后,其长子复株累单于即位,按照匈奴的“收继婚”的制度,王昭君成了新单于的妻子。王昭君与复株累单于育有两女。复株累在位10年,死时不到40岁。此时王昭君不过三十多岁,有三个年幼的孩子。此后,史籍对王昭君的其它活动,包括她何时去世,均无记载。

不过,《汉书》所记载的呼韩邪单于的一夫多妻、多子的大家庭的情况,却间接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能与王昭君相关的信息。这个家族单是给呼韩邪生了儿子的“阏氏”就有好几位,例如颛渠阏氏、大阏氏、五阏氏等。她们背后的支持者是阏氏们的娘家——匈奴有势力的贵族。因而权力之争异常激烈。

王昭君来到匈奴的时候,呼韩邪单于已经年老,他死后的权力分配问题日渐提上日程,因此呼韩邪单于家族的关系变得格外紧张。不难想象,呼韩邪的阏氏们对年轻貌美、且有汉朝支持的王昭君的到来,会怀有怎样的敌意。而且,王昭君来到匈奴后,很快生下伊屠智牙师,使匈奴贵族的权力争夺中又增加了一个对手。近五十年后,呼韩邪单于的五阏氏之子舆即位单于,为了传位于自己的儿子,杀害了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所生的儿子伊屠智牙师就是明证。此时,伊屠智牙师年纪尚不满五

[1][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2]张海鹏选编:《2010中国年度初中生优秀作文》,〔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年版,第90-91页。

[3]邵思思:《研究历史要怀有敬畏之心——访复旦大学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姜义华教授》,〔北京〕《理论视野》2013年第12期。

[4][6]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9页,第297页。

[5][7]班固:《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第3017页,第3806页。

[8]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3806页。

十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

呼韩邪单于死前,与他当年十分宠爱的颛渠阏氏与大阏氏商议他的继承人的问题。颛渠阏氏与大阏氏是亲姐妹,不仅有共同支持他们的娘家势力,而且姐妹二人关系密切。颛渠阏氏为姐,生有且莫车、囊知牙斯二子;大阏氏为妹,生有雕陶莫皋、且糜胥、咸、乐四子。呼韩邪单于从颛渠阏氏计,“立雕陶莫皋,约令传国与弟”^[1]。于是,两姐妹的六个儿子,以年龄为序排出的继承单于之位的顺序是雕陶莫皋、且糜胥、且莫车、囊知牙斯、咸、乐。在以后将近半个世纪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就是按照这一顺序顺利地进行单于之位的交接。排序时,王昭君的儿子尚在襁褓之中,没有任何竞争力。

可以想见,能够参与决定王位继承权的一对强势的姐妹阏氏,即使是迫于汉王朝的压力,也不能听凭王昭君参与匈奴政务,左右单于意志。因此,在激烈的王权斗争中,王昭君自保已经相当困难,再如论者所说“创造和平岁月”,实在是想当然的虚构了。

那么,一些研究者津津乐道的关于王昭君与她的后代们共同创造了汉匈60年和平局面的说法是否有文献依据呢?《汉书》载,在王昭君所生的三个子女中,长女名云,即须卜居次,是参与汉、匈交流最多的一位。王莽专权时,为了笼络他的姑母——汉元帝的皇后、当时临朝称制的太皇太后王政君,“乃风单于令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赏赐之甚厚”^[2]。《汉书·王莽传》也有相同的记载:“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入侍。所以诳耀媚事太后。”^[3]

也就是说,王昭君的女儿只不过是王莽用来“诳耀媚事太后”的工具,并无自己多大的主动权。不过,她的一半汉人血统,使她对西汉朝廷以及新莽政权最为亲近,“常欲与中国和亲”^[4]。匈奴内乱,云与其丈夫须卜当一起劝乌累单于(咸)和亲,依靠新莽政权为后盾,充分显示了亲汉立场。最后,云全家被王莽胁迫至长安,除了她的小儿子中途逃回匈奴得以生还,其夫当病死长安,云与其子奢则在赤眉军攻入长安,汉兵诛莽之时,死于乱兵之中。

云确曾为汉匈友好交往做了一些努力,但屡屡被刚愎自用的王莽所左右,最后成为王莽种种倒行逆施的牺牲品。这一不幸结局,比起她的母亲王昭君来,更加令人伤感。

无疑,“昭君出塞”确实起到了某些巩固汉、匈和平的作用。昭君的子孙后代被派往长安做“奉献”一事^[5],从匈奴决策者角度看,也是在打亲情牌,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和强化了“昭君出塞”的效应。但是,如果因此将这段历史中完全被动的承受者——昭君和她的子孙后代们变成主动维护和平的自觉者形象而夸大其历史作用的话,不但简化了民族关系,而且缺乏对于昭君们生活境遇、内心情感的人性体察,更为重要的是将导致我们远离客观真实的历史,使得浅薄寡陋、谎话连篇的实用主义史学和文学得以大行其道,这一教训应当牢牢地记取!

习近平主席在近期一系列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了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他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6]这应该成为我们反思20世纪60年代以来“王昭君现象”的新的起点。正视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气度。中华民族要复兴,就必须正视自己的历史,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责任编辑:肖 波〕

[1][2][4][5]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3807页,第3818页,第3827页,第3829页。

[3]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第4051页。

[6]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